

二十一世紀評論

別了，二十世紀

站在美好新世紀的門檻上

陳方正

一 從魔瓶釋放出來的巨靈

新世紀、新千禧年立刻就要降臨了。只要翻開任何一本科學或商業雜誌，或者稍為運用一下想像力，我們就都會情不自禁，為美妙的未來感到興奮、激動、腦筋發熱。想一想吧，整個人類基因譜將被完全解讀；克隆人將會誕生和繁殖；以遺傳工程「製造」的血液、皮膚、器官將會充斥人體；電腦將用日常語言與人溝通，智能型機械人將提供各種服務；互聯網將像空氣一樣無處不在，維繫所有人的意念和思想；微電子精靈元件和「甲蟲」將不斷監測汽車、機器、街道、交通體系以至大廈、房屋和人體內部情況；時速五百公里的火車、超音速噴射機乃至太空旅行都會日益普遍。而且，這些並非空中樓閣、天方夜譚，也不是數十百年後才可能實現的遠景，而是十多二十年間，甚至三五年間就會發生的事情，是多數人在有生之年大有機會親眼目睹的景況。其神奇、美妙，令人心往神馳，就在於此。

當然，「綠色和平」戰士、「上帝神殿」兒女、奧姆真理教信徒，還有不少哲學家甚至科學家，以及許多其他普通人都對這個能摧毀一切阻擋力量，大步飛奔前進的新世界感到迷惑、憤慨，甚至沮喪莫名，不寒而慄。然而，他們人數雖然眾多，聲音也十分激烈，對這時代狂潮卻恐怕起不了多大抑制作用。現代文明無論在應付外部「蠻族」或者內部反叛份子的頭腦和力量，已遠非羅馬或漢唐帝國所能比擬。因此，已歷時五千年的長期技術累積和相應社會變革不會再輕易遭受逆轉或者陷入停滯，而只會以不可思議的速度飛躍上升，令人類千百年來的夢想甚至幻想、狂想在下一個世紀實現，使新的千禧年成為名副其實的「充裕、幸福、圓滿」時代。

新世紀、新千禧年立刻就要降臨了。歷時五千年的長期技術累積和相應社會變革不會再輕易遭受逆轉或者陷入停滯，而只會以不可思議的速度飛躍上升，令人類千百年來的夢想甚至幻想、狂想在下一個世紀實現，使新的千禧年成為名副其實的「充裕、幸福、圓滿」時代。

然而，從科技魔瓶釋放出來猶如巨靈的不可思議力量，是那麼脆弱、自私、貪婪、愚昧、乃至邪惡的人類所能駕馭和善用的嗎？它創造的種種奇迹，是這世界所真正需要的嗎？它真能為人類帶來幸福嗎？科技發展會不會，應不應該停下來，讓人類冷靜地思考一下呢？自十九世紀以來，這些問題不斷困擾着思想家、哲學家，但從來不曾有過令人滿意的答案。今天我們站在又一個新世紀，而且是新千禧年的門檻上，這無疑是再次認真反省同一問題的時候了。

二 改變現狀的強烈衝動

讓我們先回顧一下歷史上科技和相應社會變革所遭遇的嚴重問題吧。第一個大問題出現於十九世紀，那就是社會的劇烈分化，和由分化而產生的極大不公平。馬克思對這問題的答案是改變生產關係，從而釋放更大生產力，以達到理想共產主義世界。過去一百五十年的經驗顯示，生產關係雖然需要調整，卻不必作根本改變；提高生產力的關鍵不在生產關係，而在科技發展。當然，這是目前仍然宰制全球經濟體系的資本主義觀點。對這觀點最深刻的批評是：它在本世紀的成功，是基於先進國家將社會分化和不平等從國內轉移到國外，從歐美轉移到南北半球之間。這批評雖然有力，卻也凸顯了所謂「資本主義」的驚人彈性和生命力。那也就是說，在下一世紀它極有可能發生更大「變形」以適應科技發展和經濟全球化所產生的新問題。無論如何，世界經濟體系的大幅度調整，甚至脫離我們所熟悉的傳統資本主義形態，並不意味其崩潰。

第二個大問題出現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那就是人在大眾消費社會為商品浪潮淹沒，淪為經濟機器之奴隸，從而感到嚴重的疏離、無助、異化、生命意義之喪失。「人」自我意識之腐蝕與扭曲為形形色色的存在主義哲學以及反建制運動鋪平了道路。60年代美國大學校園中風起雲湧的反越戰運動、民權運動、言論自由運動，以及1968年夏天法國的反建制大聯合，可視為疏離的知識份子對現代文明社會抗議的高潮，1975年美國在越南的潰敗則是其力量的象徵。然而，弔詭地，抗議的成功消解了危機。況且，與加繆(Albert Camus)的《反叛者》(*The Rebel*)、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的《單向人》(*One Dimensional Man*)等存在主義呼聲同時期出現的，還有麥魯恆(Marshall McLuhan)所創造的「地球村」概念，它預示了今日沉醉在電視、電腦、互聯網上的青少年的特殊心態。曾幾何時，「孤獨的群眾」不再孤獨，他們的心靈日漸融化於無處不在的電子媒體之中。從文字和印刷術所主宰的「線性宇宙」過渡到電磁波上的多維度影音世界只需短短三十年(1960-90)，即一代人的光陰。此後祈克果、卡夫卡、馬塞爾(Gabriel Marcel)等大批哲學家所感到那麼焦慮、迫切的問題已被絕大多數人遺忘，或竟為今日的「新人類」乾脆取消了。

第三個大問題則是環境生態的破壞——能源、森林、海洋、大氣之斲伐、污染；居住環境和食物供應體系在急速工業化、科技化下呈現的弊病；植被和

麥魯恆所創造的「地球村」概念，預示了今日沉醉在電視、電腦、互聯網上的青少年的特殊心態。曾幾何時，「孤獨的群眾」不再孤獨，他們的心靈日漸融化於無處不在的電子媒體之中。昔日大批哲學家所感到焦慮、迫切的問題已被絕大多數人遺忘，或竟為今日的「新人類」乾脆取消了。

食物鏈的失衡，等等。臭氧層「穿洞」、溫室效應、愛滋病和瘋牛症的爆發只不過是其最顯著的例子而已。顯然，科技帶來的變革對自然比對人和社會的衝擊還要厲害。

但這些問題是否就無從解決，或者會迫使人類生活方式徹底改變呢？其實，環保工作已經在許多方面獲得重大進展，並且發展成強有力的跨領域綜合科學。由於其出現和應用，發達國家的環境質素遠比發展中和落後國家優勝，那也就是說，環境問題仍然只不過是科技發展過程中的階段性現象，原則上是可以克服的。最近興起的「十倍運動」(Factor 10 Movement)，即通過再循環、再設計而將工業產品的消耗減少90%，亦即將其效益擴大十倍的運動，是從權宜應付到謀求徹底解決環境問題的轉變，也不啻為現代文明拒絕從發展道路退卻的宣言。環境問題會迫使人類努力節省能源、消除污染、保護生態，甚至減低發展速度，但不可能令人類放棄噴射機和電腦，或者阻擋分子生物工程在醫學、畜牧、農業上正在掀起的革命。

自然，除此以外，還有無數其他問題困擾着現代文明：各種新興宗教教派的瘋狂行徑，以及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諸如核彈、沙林毒氣的擴散，是最明顯的例子。所以，不能否認，科技這一巨靈隱藏着嚴重危機，現代文明的確可能為其本身所發展出來的龐大力量所重創乃至摧毀。不過，雖是如此，人類卻絕無受到這種可能性的阻嚇而延誤，更不要說放棄科技變革的跡象：怵目驚心的空中災難令人重視航空安全，但從不曾威脅航空業的發展。事實上，過去五百年間人類不屈不撓(也可以說瘋狂)地以智能、技術和組織去改變現狀的強烈衝動已成為無可抗拒的大潮流，是任何實際困難或巨大危險都無法阻擋的。

華倫斯坦預言，資本主義文明將在下一世紀成為過去，那似乎聳人聽聞。其實，資本主義的消融可能並非由於其內在矛盾，反而可能是由於其成功，由於財富之膨脹令其獨佔失去意義，不復成為社會的基本動力。它的消融，並沒有理由令歷史進程停下步來。

三 目標究竟何在？

然而，這無可抗拒的大潮流目標究竟何在？其莫大力量到底從何而來？那是我們在探究它的意義之前必須首先面對的問題。最顯淺、最現成的答案自然是：改善人類生活。而單單從任何一項科技發明的出現來看，也的確如此。然而，何謂生活之「善」，卻並非簡單問題。飛機、電視、電腦、宇航火箭、遺傳工程真有「需要」嗎？真值得為之營役、操勞、計較、鬥爭嗎？現代世界已經完全落入老子所謂「盲聾爽狂」的境地，其「善」到底安在呢？人類以目前已經充分掌握的技術、知識，已絕對有能力為全世界每一個人提供舒適溫飽。那麼，以瘋狂速度解讀人類基因譜，或者每年要把電腦能力提高一倍，就難以用「改善生活」這種簡單觀點加以解釋了。

當然，還有一個不那麼明顯，但也眾所周知的答案：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創造了一種機制，一種思想和行為模式，令支配、享用財富的欲望與創造財富的努力緊密配合，令權力欲通過駕馭大自然而得到滿足。創造財富的法門可以是遠洋貿易、海外殖民、大規模商品生產，也可以是以科技為基礎的現代工

業。從這個觀點看來，社會變革的原動力是資本主義而不是科技，科技只不過是前者的工具，它的發展也是為其所驅動的。

這一觀點有相當道理，但也並非真正答案。首先，沒有科技這一巨靈的肩負，資本主義也許能在西歐興旺一時，但決不會獲得足夠軍事、經濟優勢，去宰制歐亞大陸上的其他古老帝國，迫使它們在「全球化」浪潮下接受同一體制。更重要的是，資本主義並非一成不變、具有固定本質的社會體系。例如，目前在所有發達地區，包括最放任、自由的香港和新加坡，由政府規劃、管理的公共經濟在國民總產值中已佔20-60%。又例如，在互聯網衝擊下「版權」制度甚至觀念已出現嚴重危機。華倫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預言，資本主義文明將在下一世紀成為過去，那似乎聳人聽聞，但蘇聯東歐陣營瓦解不更出人意料嗎？其實，資本主義的消融可能並非由於其內在矛盾，反而可能是由於其成功，由於財富之膨脹令其獨佔失去意義，不復成為社會的基本動力。在歷史長流中，科技進步和社會變革從未止息，而資本主義只不過佔其中一小段而已。它的消融，並沒有理由令歷史進程停下步來。

四 新的不朽

因此，我們還是要回到原來的問題：科技發展的原動力是甚麼？也許，我們可以從回顧近代歷史上那些關鍵性變化開始：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哥白尼、刻卜勒、伽利略、牛頓創立第一個現代科學體系，達爾文提出生物進化證據，湯姆遜 (J. J. Thomson) 發現電子，萊特兄弟發明飛機，以至薛定諤 (Erwin Schrodinger) 和海森堡 (Werner Heisenberg) 發現量子力學，基爾比 (Jack Kilby) 和奈斯 (Robert Noyce) 發明矽晶片上的整合電路，等等。所有這些變化的共同點在於：它們都是由個別特立獨行之士所發現、發明，都是個人創造力的表現。這創造力並不是政治上開創新局面、新秩序，即「立功」；不是樹立道德楷模，為人典範，即「立德」；也不是以文章、言論垂聲後世，即「立言」。傳統的三不朽是建立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是以人為中心的觀念。而哥倫布、牛頓、達爾文等人所建立的不朽，卻是基於人對自然的理解：它「超越」人事，是客觀的，並非完全由人來承認和判斷的。它也許可以稱為「立則」，即建立自然法則。

科技發明本身是超越和客觀的，表現出這種創造力的個人則可以有許多不同動機、期望、追求：哥倫布渴望光榮與財富，刻卜勒嚮往神秘主義，牛頓與愛因斯坦為自然法則的奧秘入迷，萊特兄弟酷愛飛翔的自由……。這些追求絕大部分有一共同點：它們都源自個人內心的渴望與衝動，都是個人率性任性、自我伸張的結果，而並非由於對國家、民族那些龐大群體的責任感、使命感而來。另一方面，這些特立獨行之士的影響力卻又必需在適合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之中，才能夠充分發揮出來。這環境必須容許個人有相當大的經濟空間，那是我們今日已經十分熟悉、十分認同的市場經濟體制，可以不必多說。同時，它

科技發展的原動力是甚麼？回顧歷史上那些關鍵性變化，它們都是由個別特立獨行之士所發現、發明，都是個人創造力的表現。這創造力並不是政治上的「立功」；不是樹立道德楷模的「立德」；也不是言論垂聲後世的「立言」。哥倫布、牛頓、達爾文等人所建立的不朽，卻是基於人對自然的理解，也許可以稱為「立則」。

還須容許個人有相當大的政治空間，亦即我們今日經常提到的民主體制。這其中理由，倒還是需要討論的。

科技與民主真具有內在關係嗎？倘若把科技單純視為學術發現，把民主供奉為一種理想，一種美好價值，那肯定沒有關係：《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恰好出版於光榮革命之前一年，拉瓦錫 (Antoine Lavoisier) 在法國大革命中上了斷頭臺，陸白雪夫斯基 (Nicholas Lobachevsky) 和門捷列夫 (Dmitri I. Mendeleev) 則是沙皇治下臣民。但倘若將科技視為引發社會變革的原動力，那關係就非常之重要了。其中關鍵在於：社會變革必然導致理念與生活方式的轉變，以及利益的再分配，而只有通過民主程序，也就是取決於多數的原則，這種基本轉變才能迅速反映於政治結構與實際決定。換而言之，只有民主體制才有足夠力量衝擊既得利益階層所已建立的體制，才能為社會提供在相對和平、穩定狀況下不斷變革的機制，才能釋放科技進步所產生的社會動量。英國的工業革命與其議會選舉權的大幅度擴張發生於同一時期，而蘇聯傾力發展科技，但在與美國的長期競賽中仍然不免筋疲力竭而崩潰，就是上述機制重要性的最佳明證。

科技與民主真具有內在關係嗎？倘若把科技單純視為學術發現，把民主供奉為一種理想，一種美好價值，那肯定沒有關係。但倘若將科技視為引發社會變革的原動力，那其中關鍵在於：只有民主體制才能為社會提供在相對和平、穩定狀況下不斷變革的機制，才能釋放科技進步所產生的社會動量。

五 伊甸園中的「新人類」

然而，由個人發揮創造力而推動的科技發展到底代表甚麼？到底有何目標，有何意義？這仍是我們要面對的問題，也是今日人類文明問題的核心。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自然界的進化現象得到啟示。進化是眾多遺傳基因不斷發生變異，令在生存競爭壓力下的生物種別為自然所淘汰或者選擇的結果。整體而言，它並沒有終極目標。同樣，科技進展是許多個人的異常追求、探索經過客觀證驗之後所得結果的集合。它對人類整體在當下環境中的生存、發展有莫大助力，但除此之外也並無任何固有的、根據某套理念而訂定的整體目標。這一特點，恰恰就是其巨大力量的秘密之所在。自然進化不可能停止，因為在資源有限的自然環境之中生存競爭不可避免；同樣，科技發展和相應社會變革不可抑止，因為每一項發現、發明都賦與掌握和充分運用這一自然法則的集團、國家以更強大的力量；其結果是：周遭集團、國家只有隨之而變革，或者遲早被消融、整合這兩條路。在本世紀初盛行一時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已隨着民族主義之興起與殖民主義之結束而被遺忘。作為一種理念，它之失去吸引力，是很自然的事。但進化論卻並非主觀理念，而是客觀科學理論，用之以分析產生社會變革的動力，仍然是極為有力的工具。

進化導致了更複雜、靈巧、適應和宰制能力更強的高等生物，乃至已經超越自然「生物」階段的「萬物之靈」的出現。這是生物由於進化而產生的「異化」，即其本身之超越和蛻變。同樣，科技進展導致了全球性文明的出現。這文明有十分深厚的歷史根源，但顯然已經完全脫離（或者更應當說超越）它根源中那些個別的文化、宗教、思想體系——事實上這些體系都已經解體，其遺留下來而仍然有價

值、活力的那些片段，則已經被吸收、融合到新文明之中去，繼續發揮作用。這文明本來以個人為中心，但顯然又正在急速地改變人的精神面貌，令個人無論在思想、情感乃至精神上，都再也脫離不了全球文明的深層控制。毫無疑問，這是人由於科技變革而產生的異化。不少人把這一蛻變視為災難，視為過份放任「浮士德精神」所造成的不幸後果，是能夠，而且必須通過恢復「人性」和「理性」而加以矯正，加以挽回的。可是，所謂異化同時亦是「人」這一被視為神聖本體之超越；像生物的進化一樣，這蛻變恐怕也是不可逆轉的。伊甸園在五百年之前已經失落，它雖或可以重建，但居民恐怕將是我們所感到陌生的「新人類」了。

在已來到我們面前的新世紀之中，不但一般人的生活、思想、娛樂、財務會被「聯網」，社會、經濟和政治體制也同樣會被各種越來越緊密的國際組織所繫結、規範，成為一體。全球通行的流動電話、香港剛剛迎來的迪士尼樂園，還有中國即將加入的國際貿易組織，可以說是這「一體化」的最好象徵。甚至，本來以個人為中心的科技發展也不例外，也正從個別科學家、發明家的苦索深思，變為大企業、大實驗室中數千百人組成的龐大科技隊伍的緊密與長期合作。《物種原始》基本上是達爾文個人的孤獨工作，今日解讀人類基因譜的樊特 (Craig Venter) 則是一個商業科研王國的總指揮。牛頓說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所以望得更遠；今日我們也仍然有像愛因斯坦、霍金 (Stephen Hawking) 那樣登高望遠的孤獨天才。但在下一個新世紀，絕大部分科技新發現和大進展，恐怕都將會是由奧本海默 (Robert J. Oppenheimer) 那樣領導曼哈頓計劃的「科學政治家」所統籌的了。

對於在傳統文化孕育中成長的人來說，從有獨立價值和內在精神的人，變為「新人類」的一份子，變為全球文明體系中的一粒微塵，無疑是極端痛苦的事；而那個他們所熟悉的，秩序井然，具有固定價值系統，由文學、詩歌、音樂、美術、哲思等優美事物交織而成的舊世界之破碎、消失，更是一場不折不扣的夢魘。但對今日在電視、電腦和互聯網上長大的「新人類」來說，這卻是在通往新伊甸園的超級公路之上，一個賞心悅目、五彩繽紛的愉快旅程。在今日，這日漸湧現的伊甸園仍然處於第三世界的包圍和困擾之中，但它的力量，它的美好前景，正在迅速吞噬周圍的傳統文明，正在從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還有心理上，無可抗拒地擴張它的領域。

在本世紀初，侈談世界主義，而不認識民族主義的重要和力量，是幼稚、可笑、一廂情願的。在今日，在國界日漸為全球經濟體系所泯滅的時代，即使對力量強大和人口眾多如中國者而言，再單純致力於所謂傳統文化的「弘揚」，或者「民族」的興旺、發展，其長遠意義就不免引起疑問了。在即將來臨的新世紀、新千禧年，在急速呈現的全球文明體系中，中國人到底怎樣才能發揮他們的力量，作出他們的貢獻，那是需要深思的。

在本世紀初，侈談世界主義，而不認識民族主義的重要和力量，是幼稚、可笑、一廂情願的。在今日，在國界日漸為全球經濟體系所泯滅的時代，即使對力量強大和人口眾多如中國者而言，再單純致力於所謂傳統文化的「弘揚」，或者「民族」的興旺、發展，其長遠意義就不免引起疑問了。